

「磨不穿」的藤椅

本报记者 田勇

行记

河南兰考，黄河故道。
我们走进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展厅中央，一把旧藤椅静静立。
右侧扶手下，一个窟窿清晰可见——

那是肝癌晚期的焦裕禄拿硬物顶住肝部，生生顶穿的。
纪念馆外，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前，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泡桐早已枝繁叶茂，华盖如云。
当地人唤它“焦桐”。

由兰考县城驱车出发，经东坝头镇向东约3公里，就到了张庄村。这里是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弯，也是当年兰考风沙最猛的地方。

车子停在村里的“幸福路”上。路不宽，两边的老槐树密密匝匝，荫蔽着沿街的香油坊、手工坊和农家乐。记者拐进一条巷子，来到村民游文超家。

院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地里种着辣椒、茄子、黄瓜，墙上的空调外机正嗡嗡转着，屋里燃气灶、抽水马桶样样齐全。游文超60多岁，说话嗓门挺大。

“焦书记来之前，张庄是出名的风口。”他指着门外，“庄里庄外全是沙，一亩地一年就打三四十斤粮食。活不下去，乡亲们只能往外逃。”

记者问，那焦裕禄来村里具体干了哪些

工作？
“那可多了！查风口、追沙源，带大家种树、翻淤压沙。”游文超说，“他的恩情，我们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86岁的卞九龄，是村里为数不多见过焦裕禄的健在老人。他身材瘦削，脸上的皱纹像昔日的沙丘般沟壑纵横。“焦书记一点没有官架子，穿着一件旧棉袄，紧紧握住我的手……”回忆起第一次见面，卞九龄还没说完就用手背擦眼眶。“他来张庄次数格外多，一块地接一块地地看。翻淤压沙的办法，就是在咱们村找到的。”

焦裕禄当年通过反复试验，总结出“贴膏药”和“扎针”两招：“贴膏药”是把淤泥翻上来压住沙丘，“扎针”就是大规模种泡桐。法子听起来简单，可那是焦裕禄顶着风沙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过去的张庄村，人往外逃；现在的张庄村，人们都想回来。兰考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兰考，记者专程采访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务部副主任贾关青，想听听关于焦裕禄更多的故事。贾关青说，有一件事鲜为人知。

2021年，他在整理老旧档案时，意外发现一封焦裕禄赴任兰考前写下的亲笔信。信已残缺不全，只留存下一页。信是写给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副书记赵祥庆的。

焦裕禄写道：“四个多月来，情况基本熟悉了，这次又调去兰考，我有点顾虑，有点害怕，到那里人地两生，水平又低，又没做过主要领导工作，担心搞不好。”

短短几行字，把一名党员干部的真实想法写了出来。
但紧接着，他又写道：“但地委说那里需要，组织已经决定，那就坚决服从，有困难和大家共同克服，不懂的向原老同志好好学习。”

贾关青把这份残稿的复印件拿给记者看。纸已经发黄，但字迹清晰。“从内心志忑到坚决服从，从有所顾虑到主动担当，这就是焦裕禄最真实的一面。”他说。

1962年的兰考，正是最穷最苦最难的时候。风沙打毁20多万亩麦子，大水淹坏30多万亩庄稼，盐碱又咸死10多万亩禾苗。全县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大量群众外出逃荒。

焦裕禄带着县委同志来到火车站，看着候车室里准备逃荒的受灾群众，心里五味杂陈。回

到县委，已是午夜。他说：“党把兰考36万人民交给了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之后，他就把彻底根除风沙、内涝、盐碱“三害”作为全县中心工作，经常去最苦的公社、最穷的大队，调查研究。誓要亲手掂一掂“三害”的分量。

1963年夏天，焦裕禄组建“三害”调查队，并亲自带着干部、技术员、农民，查风口、探水势、尝盐碱，一个多月走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5000多里，把所有风口、盐碱地、低洼易涝地、阻水工程逐一绘图编号。

就这样，一张改造兰考的蓝图，在他手里一点一点成了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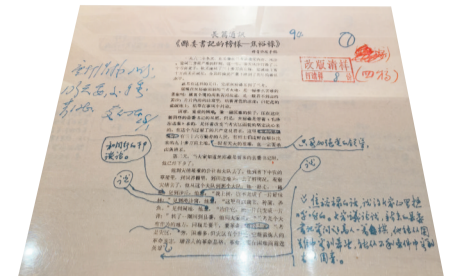
很多人问，焦裕禄一个从工厂出来的干部，怎么那么快就摸透了“三害”治理的门道？

贾关青告诉记者，答案在焦裕禄早年的经历里。1955年初至1956年底，受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委派，焦裕禄前往大连起重机械厂实习。那时候他对工业管理还一窍不通。但他积极地向车间干部学管理，向调度员学流程，向工人学技术。一年多下来，就成了业务能手，被工友们誉为“最棒的车间主任”。“这份虚心求教的习惯，他完整带到了兰考。”贾关青说，“他拜基层干部、农民、技术员为师，并将大工业系统化、条理化、精细化的管理思维运用到除‘三害’中，探索出了一条县域治理的新道路。”

也正是在兰考的日子里，焦裕禄的病情开始恶化。肝癌带来的疼痛日益加重，他没法办公，就把藤椅挪到桌边，侧着身子，随手拿一个硬东西顶住右侧肝部。日子久了，藤椅右侧扶手下被硬生生磨出一个大窟窿。

卞九龄老人拉着记者的手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肝癌疼得厉害。可他还在坚持工作。”“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他得了那么重的病，只觉得焦书记瘦了，瘦得很。”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他要求把自己埋在沙丘上：“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修改稿样。

60年过去了。焦裕禄虽没能看到兰考“千顷澄碧”，但他当年绘下的蓝图，已被兰考人一代一代接续干了下去。

1973年，兰考全年治沙造林19万亩，植树364万株，风沙从根本上被遏制。如今，兰考的泡桐木做成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远销30多个国家。兰考也从贫困县成了小康县。

张庄村也变了。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2015年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党员干部走遍每块土地，弄清楚哪片地该种啥、哪片地能打井。村集体办起养殖场、加工厂、农副产品销售公司，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儿干、有钱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循着焦书记的足迹，像他改变兰考那样改变张庄。”申学风说。

焦裕禄在兰考只待了一年多。但他留下了很多东西——一把破洞的藤椅，一棵参天的泡桐，还有一群始终记得他的人。游

文超说，焦书记来之前的张庄村，人往外逃；现在的张庄村，人们都想回来。卞九龄说，只要还活着，就要跟小辈们讲讲焦书记的故事。走出纪念馆时天快黑了，记者回头望去，那把旧藤椅在展厅中央静静无言。藤条会磨损，可那份为民的初心，永远磨不穿。



旧藤椅在展厅中央静静无言。藤条会磨损，可那份为民的初心，永远磨不穿。

故事永远是新鲜的

本报记者 田勇

“兰考县的故事，焦裕禄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能写出新意吗？”这是沉在记者心里的最大焦虑。踏上兰考这片土地，第一次走进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弯，听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讲自己怎样循着焦裕禄的足迹带领村民致富，焦裕禄那句格言就在记者心里扎下了根：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如果焦裕禄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永远尝不到乡亲嘴里的沙子味。当记者也一样，不亲自下田埂、进作坊，写出来的稿子也会干巴巴、全是二手货，没有一丝甜味。这一次采访，记者决定“笨”一点儿：不看现成的材料，去泡桐树下坐坐，到幸福路上走走，跟已是耄耋之年的魏善民握手。这一走，记者看到了人民心中的焦裕禄，也如愿尝到了“新馍”的滋味。

记者以前知道的焦裕禄，是教科书和影视剧里的焦裕禄，是藤椅上顶出的窟窿。但这次，记者认识了另一个焦裕禄——一个赴任前会坦陈自己“有点顾虑，有点害怕”的普通人。那封已经残缺不全的信，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

最触动记者的，是魏善民老人。他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坚持了整整55年。他的豫东话难懂，嘴里更没有什么大道理，但他握着记者的手时传来的温度，比什么话都暖人。“焦桐”年年长新叶，幸福路上天天过新人，兰考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故事永远是新鲜的。

比亲人还亲

本报记者 田勇

与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正门隔一条马路，就是焦桐广场。

一座石碑，一片草坪，一棵泡桐，构成了一个精神地标。在兰考人心里，焦桐广场很小，从南到北不过200步，东西更窄；焦桐广场又很大——一个人活成了一棵树的名字，岁岁长青。

那棵树，人们叫它“焦桐”，只为纪念一个人：焦裕禄。

1963年春，焦裕禄亲手栽下它时，这里还是一片沙荒地。农民说风沙太大，种啥都不中，栽啥都白搭。焦裕禄不信邪，亲自带领群众在这里种下50亩的泡桐示范林。

63年过去，“焦桐”长成了参天大树。茂密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荫蔽着大半个广场。每年四五月泡桐花开，远看像一团紫色的云。县里百姓说，这棵树花期比别的树长，花也比别的树密。

当年参与栽树也见证了“焦桐”一年年粗壮起来的是84岁的魏善民。

清晨5时30分，一如55年来守树风雨无阻，有些驼背的魏善民准时出现在广场上。中等个子，头发花白，皮肤泛红——这是魏善民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
听说记者来意后，魏善民握住记者的手说：“我替焦书记感谢你，感谢你们辽宁百姓，感谢你们还惦记他！”

他操一口豫东口音，话语很难听懂，要靠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的老师帮忙“翻译”。但他眼神里的真情，直直地打到记者心窝里。

“栽树要两个人。那时我20出头，焦书记喜欢我，咱俩就分到一个班。”魏善民说，一开始焦裕禄要下手刨坑，他想着刨坑费力就抢着干，焦裕禄不同意。后来两个人轮着刨，可趁着他休息，焦裕禄还是抢着把坑刨完了。

魏善民有个小本子，清清楚楚记着哪年哪月施的什么肥、打的什么药、疏的哪根枝。“这棵泡桐树，是俺的亲人！不，比亲人还亲！”他说。

“种树的时候我是小伙子，现在也老了。以后守树的活儿，准备交给儿子，儿

子干不动孙子接着干！”采访结束时，魏善民这样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田勇摄



84岁的魏善民当年参与栽树并见证了“焦桐”一年年粗壮起来。

